

# 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读者类型

杨 建 东

在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三要素”、“四要素”和“五要素”等说法,即认为图书馆事业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这些不同的说法被后来人们简称为“要素说”。在“要素说”中,虽然各家对要素的多少看法不一致,但都有一个读者要素。由此可见,读者在图书馆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读者来进行的,为读者服务的工作是图书馆全部工作的着力点,为读者服务工作的好坏,直接体现一个图书馆贯彻办馆方针和完成图书馆总任务的程度,是衡量图书馆工作质量的尺度。

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随着图书馆性质的变化,读者范围和数量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我国图书馆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到今、从简到繁、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图书馆读者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从古到今、从数量少到数量多、从读者面窄到读者面广的发展过程。读者的发展如同图书馆的发展一样,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图书馆读者的发展过程,对于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探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是有益处的。本文不揣浅陋,仅对我国古代图书馆的读者类型谈点粗浅看法,以求正于读者和同行们。

不论在任何社会,任何类型的图书馆中,它们都有自己的读者,没有读者的图书馆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国古代社会的各类型图书馆莫不如此。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掌握文化的是帝王将相和地主阶级,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和物质进行藏书、读书的活动,广大人民是无权阅读书籍的。所以,在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上,大量记载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重视藏书的收集、整理的史料,却很难找到古代劳动人民建立图书馆、利用图书的材料。历史上虽有农民起义、农民革命,但因战争之频繁,行旅之不定,失败之迅速,也根本不急考虑图书馆的建设。所以,我国古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对象仅限于中、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分子中,人数很少,范围很窄。也正因为如此,有不少人喜用“藏书楼”来称呼古代的图书馆,并由此总结出我国古代图书馆的特点是注意收藏,不重使用。这个结论是十分确切的。但由于缺乏深入的分析研究,往往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我国古代图书馆是“只藏不用”,甚至认为古代图书馆根本无读者,这种看法则未免偏颇。根据历代史书上记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都十分懂得应重视图书馆藏书的收集与利用。为了宣扬适合于统治阶级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为了“点缀升平”,宣扬君王的“文治”,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为了培养、选拔和储备忠诚为皇室服务的高级官僚人材,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为了笼络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争取更多的忠顺奴才来维护其封建统治,必须重视藏书的利用;为了推行学校和科举制度,培养更多的御用文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后备军,也须重视藏书的利用。从上说明,封建社会的各类型图书馆,尽管是以藏为主,重藏轻用,但决不是只藏不用,那种纯粹是为藏书而藏书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有了藏书的利用,必然有利用藏书的读者,尽管读者人数少、面窄,但他们毕竟还是利用藏书的读者。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我

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事实。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千五百多年的殷墟甲骨的发现，证明中国古代藏书形式的出现应溯源于殷商时代。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图书馆的形式，但随着藏书的萌芽，并设有史官专门管理，还有专门保管甲骨卜辞的处所，说明它已带有皇家图书馆的雏型。

国家藏书和专门管理藏书机构的出现，必然有阅读藏书的读者。当时的国家藏书被奴隶主阶级所垄断，他们是利用藏书的第一类读者。此外，当时的文化教育基本上操纵在巫师手中，他们掌握文字、垄断知识，把文化作为宗教的附庸。巫师和掌管藏书的史官没有显然的分职，这些巫师就成为利用藏书的第二类读者。上述两类读者虽然是奴隶社会中的极少数，是一伙反动的统治阶级，但他们毕竟还是利用藏书的读者。由此可见，我国的图书馆早在雏型时期就有利用藏书的读者。至于广大奴隶，他们毫无一点自由和社会地位，根本没有可能掌握文字和阅读藏书。这也说明，雏型时代的图书馆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代替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了学术文化的大发展。此时期“士”阶层出现，私学兴起，私人著书立说盛行，于是书籍的数量不断增加，国家藏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收藏书籍的处所当时叫“盟府”或“故府”，虽然仍处于图书馆的雏型时期，但它已开后世封建藏书楼的先河。

此时期利用藏书的读者主要是掌管藏书的御用史官及其所服务的封建统治阶级；其次是“士”的阶层也开始普遍利用藏书。这些“士”的阶层，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权者的后备军，是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藏书，使雏型时期图书馆的读者多了起来；此外，韩宣子到鲁国去阅读了鲁国所保藏的图书，孔子删诗书，修春秋，子夏等十四人求借周室国家藏书中的史记，得观“百二十国春秋”，这都是当时利用藏书的事例。<sup>①</sup>从上说明，此期利用藏书的读者略比殷商时期多，但仍是极少数，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利用藏书、获得知识的权利的。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国家藏书楼（即国家图书馆）是在汉代汉武帝时。从这时起，随着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官私藏书楼有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在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之后，在宋元明清几代，各种类型的封建藏书楼都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开始是单一的国家藏书楼，发展到以后公私藏书楼同时并举。掌握经济、文化特权的书院、寺院等文化机构，也有自己藏书和图书活动，于是又出现了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上述藏书类型，是我国封建社会四种类型的藏书楼。

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藏书楼，其共同点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由于各自建藏书楼的目的不同，任务有别，所以四种类型藏书楼的读者对象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专为帝王服务；有的在为帝王服务的同时也为朝廷大臣服务；有的是为士大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服务；有的只为本家族子弟、亲友服务；有少数比较开明的藏书家将其藏书对外开放，允许他人借阅等等。上述服务对象是就总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古代各类型藏书楼的读者对象是复杂的，情况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是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利用藏书的读者人数就会多一些，读者面就会广一些。这期间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过程。下面就四种类型藏书楼中影响最大的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以及书院藏书楼的读者类型作简单分析。

## 一、国家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封建社会国家藏书楼的读者，概括起来有下列五种类型：

第一类读者是帝王。封建社会里，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财产都看成是他私人的财产，他当然是国家藏书楼的第一号读者。历代的皇室藏书基本上是供皇帝一人使用的。历

代史书中记载皇帝利用藏书的史料颇多：“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一边禁止人民藏书，自己却在阿皇宫内建立图书馆，收藏律法、地图、户口等资料，供他处理政事时参考；在西汉初期，“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sup>②</sup>这说明，不爱诗书的汉王刘邦，为了维护其统治，也利用了从秦帝国接收过来的图书资料；北宋时，“上（太祖）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sup>③</sup>这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向史馆（即国家图书馆）借过书；在明代，明太祖、明成祖等建立皇室藏书，不时加以利用。他们时常入殿，翻阅典籍，或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等等。从上述说明，历代帝王是利用了藏书的。皇帝读书，往往有人“侍读”，这也是利用藏书的读者。

第二类读者是历代朝廷大臣等高级官僚，如将相王侯、公卿等。这批人是封建帝王的台柱，他们的权力仅次于皇帝，要利用国家藏书当然方便得很。其中有些人自己也热衷于收藏图书，成为私人藏书家。史书上记载历代朝廷大臣利用藏书的史料不多，但仔细寻找还是有迹可寻的。例如，汉代初期，肖何编制律令，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就经常利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宋代史书中记载：“帝谓宰臣曰：近闻图书之府，甚不整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书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诏除诸王宫给抄写外，余并督还之。”<sup>④</sup>从这段资料说明北宋崇文院（即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朝廷大臣是可以公开出借的，即使出借不还，造成藏书散失也未停止出借，只是要求催还而已。崇文院的藏书不仅可以出借，而且还有“借本书库”。不仅大臣们出借，而且对临时性的科场也供应，并有一套借阅的管理制度；明代史书中记载：“……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帙。”<sup>⑤</sup>而“柘黄之帖，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这也说明，明代的朝廷大臣是经常借阅国家图书馆的图书的，但由于管理不善，制度不严，致使藏书丢失；清代的国家图书馆有七阁（即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等）。除文津、文溯和文源等三阁专供皇帝使用外，其他四阁都允许朝廷大臣、公卿、翰林等就阁借阅，但不得携出室外。乾隆五十五年下令：“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馆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sup>⑥</sup>将江南三阁（文宗、文汇和文澜等三阁）对外开放，允许士大夫、学者借阅。开始只能就室阅览，后来也允许借出抄写。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藏书楼第一次对外开放。虽然统治阶级开放三阁的目的是为了拉拢和麻痹知识分子的，但藏书开放后，利用的人多了，读者面广了，特别是开创了封建社会国家藏书楼对外开放的先例，对促进以后藏书楼对外开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类读者是经皇帝特许在图书馆里读书的人。历代帝王都注意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培养、选拔忠实为他们服务的高级官僚人材。将选拔出来的人送到国家藏书楼去读书，以求深造，学得统治人民的理论和方法。据史书记载，北宋时“祖宗朝，有馆阁读书，或上书自陈，或美妙被选，或宰执子弟。”<sup>⑦</sup>这说明当时能在崇文院读书的人有三种：一是“上书自陈”的，即上书请求在崇文院里读书；二是“美妙被选”，即通过考试选中，允许在崇文院读书；三是获得特许的宰执子弟。北宋时确有一部分高级官僚是通过这条途径培养出来的。例如，年仅十一岁的杨亿、十四岁的晏殊、十五岁的宋绶，都是经过考试入崇文院读书，成为国家藏书楼的读者。后来他们均当了大官，如杨亿官至翰林学士，成为西昆体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明朝的各代皇帝也十分重视利用皇室藏书作为培养吏材的场所。明成祖时，曾以新取进士中挑选“材质美敏者”送往文渊阁（即国家藏书楼）进学，如永乐三年就有曾棨等二十九人进入文渊阁读书，阁内还为他们安排住宿膳食文具等<sup>⑧</sup>，让他们充分利用藏书进行自修，以培养封建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第四类读者是编著书籍的作者。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编纂“正史”、“类书”等，以

宣扬他们的“文治”、“武功”，以图流芳百世。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学者等也编著了众多的图书资料，这些均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他们在编著书籍时，大多数要利用当时藏书楼的图书，有的人自己就是藏书家，他们是封建社会里著书、读书、藏书的主要力量，既是著书立说的作者，也是积极利用藏书的读者。例如，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修《史记》时，遍读了“石室”、“金匱”（宫中藏书楼）里所藏的旧史和群书；班固在修《汉书》时，也大量利用“东观”（即皇家藏书楼）等处所藏的图书档案。班固死后，继修《汉书》的班昭和马续也都曾大量参阅“东观”的典籍。当时的学者蔡邕等，被派往“东观”，“得阅皇家藏书，以治其学”，这些人都是藏书楼的读者；魏国曹丕时，命刘邵等人“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sup>⑥</sup>，利用皇室藏书编纂成我国第一部类书；唐代是国家藏书楼发挥作用较大的时期，参加注经、撰史的人很多，他们经常出入“秘书省”（即国家藏书楼）充分利用藏书；北宋的崇文院对于当时的官修和私著两类书籍均起过积极作用。如当时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等四大类书时，就大量利用了国家藏书楼的文化典籍。司马光在著作《资治通鉴》和沈括在著作《梦溪笔谈》时，也大量使用了当时崇文院等处的藏书<sup>⑦</sup>；明代在编纂《永乐大典》时，动员儒臣文士达三千人，这些人充分利用当时国家藏书楼的藏书，历时五年编成此书，达22877卷，三亿七千万字。编成如此卷帙宏富的巨著，可见当时国家藏书之丰富，利用藏书人数之多！

第五类读者是校勘图书的人员。校勘图书是历代公私藏书楼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因为古书流传，年代长久，经过手抄或刻板，错误很多，为恢复古书本来面目，必须广罗异本，校勘上下，鉴定谬误，著录残缺。校勘图书最早是在汉代。汉成帝河平三年命令刘向和其他学者在“天禄阁”（即皇家藏书楼）集体整理校勘图书，最后编成当时皇家藏书楼藏书目录——《别录》。刘向等人校书二十余年，他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校勘图书，最后编成当时国家藏书楼总目录——《七略》。刘向父子及其学者在校勘图书时，根据所有的不同本子进行校定，每校完一本，“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编写本书提要，这等于将图书馆的藏书普遍阅读了一遍。这些校勘图书的人，既是藏书楼的工作人员，也是藏书楼的读者。

刘向父子校勘藏书影响历代封建藏书楼，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历代的公私藏书大多数都进行校勘工作。藏书楼既是藏书机关，也是校书机关，这是汉代以来公私藏书楼的特点。例如，隋帝国时，曾命柳颜言等数人将国家藏书楼的藏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校勘和整理；唐太宗时，设置校勘人员二十余人，书写者一百人，还有校书的职员和工匠，校勘图书前后达四十七年之久；五代十国是动乱的时代，国家屡遭兵灾，图书时聚时散。但后周世宗时，仍派儒生三十名，将国家藏书楼的藏书加以校仇刊正；北宋的校书工作规模也十分宏大。当时雕版印刷术已盛行，有许多书经过一校再校，然后定本，刻版印刷，广泛流传。

上述五个方面，说明古代社会的国家藏书是有读者利用的。

## 二、私人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私人藏书是古代社会里第二大藏书类型。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唐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盛行，私人藏书才得到较快的发展。据《藏书纪事诗》<sup>⑧</sup>记载：从北宋到清末，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就有1100余人。私人藏书家成份极为复杂，藏书目的也各异。有的是封建帝王的宗室、贵族；有的是封建王朝的大臣公卿；有的是讲求实用的文学家、史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有的是乡村的地主豪绅；甚至还有隐逸者、僧侣、商人和城镇市民等等。私人藏书为私人所有，其藏书目的因人而异。有的是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而收藏图书，有的是想通过

藏书、读书来求得功名富贵；有的是以收藏图书供家族子孙、亲友利用；有的是以图书为古玩鉴赏；还有的是收藏图书供玩好之乐、炫耀为名等等。

私人藏书楼与国家藏书楼一样，都是以藏为主，重藏轻用。但是，私人藏书同样是有读者利用的。就其利用来说，私人藏书楼的读者面略比官家藏书楼广，藏书利用率也比官家藏书楼高。特别是宋代以后，私人藏书在数量上压倒了官家藏书，藏书质量也有很大提高。私人藏书家分散在全国各地，接近地方的学者、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些开明的私人藏书家是对他们借阅的。清代的私人藏书家曹溶在其专著《流通古书约》<sup>②</sup>中指出了为藏书而藏书流弊，诚恳地规劝藏书家不单是保存文籍，更重要的是使书籍广泛流通，务使著作者的心血不以珍蓄秘藏而与世无接。曹溶在当时能提出这种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归纳起来，私人藏书楼的读者有下列四种类型：

第一类读者是藏书家自身。封建社会里有很多藏书家就是学问家。如宋代的李常、司马光、陆游、郑樵、晁公武、陈振孙等。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全谢山、钱大昕、戴震等。这些人或因学术研究的需要，或因教育、创作、著书立说的需要，或因考订版本，校仇藏书的需要，为此，他们特别注意图书的收集与利用。有的藏书家，广搜善本，亲手校勘或刻孤本至老不厌，而且以身家生命寄托于残编断简之中。如明代的藏书家李贯之，见图籍就破产以收，获异书就焚香肃拜。祁承燾为了收集图书甚至把夫人的陪嫁物拿去换书籍。有不少藏书家特别重视藏书的利用，如清代的黄宗羲，他时常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无玩物丧志也。”他的著作如《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是他平日利用藏书楼借书、抄书所积累的资料写成的。

第二类读者是藏书家之间。在封建社会里，藏书家之间是可以互相借阅、借抄藏书的，特别是在印刷术发明前，藏书家收藏图书极不容易，因此藏书家之间借抄风颇盛。私人藏书中抄本书占有很大比重。印刷术发明后，藏书家购书极易，但因各藏书家所藏图书各有特点，为了补充私人藏书之不足，所以此时期藏书家之间抄书、借书风气仍很盛行。例如，明代的著名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与藏书家“小酉馆”主人王世贞之间，有互相借抄之约；清代藏书家丁雄飞与同代著名藏书家“千倾堂”主人黄虞稷之间也可以彼此借阅，并互订有公约——“古欢社约”。<sup>③</sup>公约规定：每月两次，“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或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藏书家之间互相借阅、借抄，互通有无，表明私人藏书可供外人使用，扩大了私人藏书的流通，增加了私人藏书与读者的接触面，提高了私人藏书的利用率。

第三类读者是藏书家的家族子孙和亲朋戚友，但不供外人借阅。封建社会中，有许多私人藏书家是非常保守落后的，他们视私人藏书如古玩，不传、不借、不卖，致使许多珍贵图书束之高阁，世人无所过目。有的甚至连族中子孙也不能随便借阅。有的私人藏书虽然可供家族子孙、亲朋戚友利用，但不对外开放，外人无缘接近，这也是有碍于社会学术发展的，是私人藏书家中保守落后部分。例如，唐代的杜暹，他的藏书后面都写着：“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的字样，<sup>④</sup>其意思是他的藏书只供子孙利用，不许卖掉或借与旁人，否则就要加上不孝的罪名。明代范钦的“天一阁”藏书，不借人，不出阅，只供子孙阅读。就是子孙阅读时，也只能白天就阁阅览，不许夜登。书厨锁匙分房掌管，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私领亲友入阁以及擅开书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与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清代有一学者想登楼看书，于头一年八月订约，次年登楼，并得范氏子孙一百零二家允许，由此可见禁锢之严。清代的藏书家钱谦益、王昶，甚至著名的版本学家

黄丕烈等，都是嗜书如命，只供子孙阅读、概不外借的保守藏书家。

第四类读者是私人藏书对外开放，供人借阅，其受惠读者为当时的士大夫、学者、知识分子以及和藏书家接近的人等。这是一些开明的私人藏书家的进步行动。虽然这样的藏书家在封建社会是少数，但他们能将私人藏书对外开放，供人阅读，不仅提高了私人藏书的利用率，而且对社会的学术发展、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例如，晋代的私人藏书家范蔚，“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sup>⑮</sup>，以其私人藏书供人自由取阅。五代时期的罗绍威，“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sup>⑯</sup>将其藏书对外流通借阅，吸引不少读者前往阅书。明代“汲古阁”藏书主人毛晋，将其藏书对外开放，允许别人借阅，四方来看书的人很多，“轴辘衔接及二十余里”<sup>⑰</sup>。宋代的宋敏求，藏书于春明宅，对外开放，“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借置故也……。”<sup>⑱</sup>等等。上述私人藏书的对外开放，当然得惠者不会是劳动人民，仅是当时的学者、知识分子等，这是私人藏书家的局限性一面，但与对世人秘而不宣的官家藏书相比，这些私人藏书家之举动是难能可贵的。

### 三、书院藏书楼的读者类型

书院藏书是封建社会第三大藏书类型。它起源于唐代，唐代开元期间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培养地主豪绅子弟的文化机构，而且也是藏书、校书的场所，是我国最早的书院藏书楼。

宋代以后，书院藏书有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宋代的书院藏书楼有几百所。明代嘉庆年间书院藏书楼达 215 所。清代乾隆年间书院藏书楼计有 571 所，几乎各省都有。除官立书院藏书楼外，还有私立书院藏书楼。书院藏书来源一是皇帝御赐，二是官吏捐送，三是本院购置、刻印入藏。

书院藏书楼的读者，主要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由于书院往往集聚了大批的文人学者，而且生徒人数众多，再加上全国书院数量不断增加，所以，书院藏书出现后，阅读藏书的读者大大增多了，藏书的利用率提高了，这是官家藏书无法比拟的，甚至私人藏书也远不能及。因为书院藏书楼的读者比较单一，仅是书院里的学者和生徒，藏书楼的建立是为他们服务的，一般来说，他们都可以阅读藏书楼中的藏书，所以，书院藏书楼的读者比较广泛，藏书利用率较高。但由于能进书院读书的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书院藏书楼的读者仅限于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弟，既不能进书院，也根本无缘利用书院藏书的。

据史料记载：书院藏书借阅管理是比较细致的，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与方法，并设有“管干”（图书管理员）专门管理藏书。例如，据宋代的《白鹿洞院志》记载：生徒借书时，写一票留“管干”处，以便考查，还书时销票。为了不误他人借阅，借书规定有期限，如有遗失，勒令赔偿。<sup>⑲</sup>

综上所述，说明我国古代的三大类型藏书楼的藏书是有读者利用的。所谓藏书楼，并不是只藏不用，也不是没有读者，只能说是重藏轻用或重藏少用，只能说是读者人数少，读者面窄，纯粹为藏书而藏书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没有读者的图书馆是不存在的。封建社会的各类型图书馆重藏轻用，这是它的性质决定的。被少数封建统治阶级把持的图书馆，必然是只为少数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它的读者必然是少数人，这也是图书馆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读者的发展也必然不会违背这个规律。但是，古代图书馆由于重视图书的收藏，且秘不

（下转第 37 页）

定, 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了关于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 等等), 使中美贸易能够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④ 美国商务部:《美国的历史统计, 殖民地时期至1937年》及补编, 华盛顿, 政府印刷局, 1960年版。

⑤⑥ 美国商务部:《美国商业》1982年2月8日。

⑥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译丛》1981年第4期。

⑦ 美国:《华侨日报》1981年3月30日。

⑧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980年10月17日电。

⑨⑩ 美国:《洛杉矶时报》1981年2月25日。

⑩ 路透社北京1981年8月28日电。

⑪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978年中美贸易统计》。

⑫ 美国:《华盛顿邮报》1981年7月28日。

⑬ 《美国1981日历年度农牧产品出口超过430亿美元》, 载美国《美国农牧产品对外贸易》1982年1—2月号。

⑭ 美国:《国务院公报》, 1981年12月号, 第22页。

⑮ 《人民日报》1982年5月9日。

⑯ 美国《华尔街日报》1982年1月13日。

⑰ 美国《商业周刊》1981年1月19日。

⑱⑲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1982年6月1日英文电。

⑲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1982年6月2日英文电。

⑳ 美联社北京1982年8月21日英文电。

㉑ 合众国际社洛杉矶1982年8月20日英文电。

---

(上接第90页)

示人, 控制极严, 这在客观上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

注释:

①①①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初稿), 第4、47页, 1980年。

② 《史记·肖相国世家》卷五十三, 中华书局1972年版, 第2014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201页。

④ 《宋会要稿·职官》一八之五十一。

⑤ 《明史艺文志序》。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

⑦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三:《选任》篇。

⑧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讲稿》, 第46页, 1959年。

⑨ 《魏志》卷二十一。

⑩ 潘天祜:《北宋崇文院的建院目的和藏书利用》, 《图书馆》1963年第一期。

⑪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⑫ (清)曹溶:《流通古书约》,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⑬ (清)丁雄飞:《古欢社约》,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⑭ (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四。

⑮ 《晋书·范平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2347页。

⑯ 《新五代史·罗绍威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6页。

⑰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

⑱ 班书阁:《书院藏书考》, 《国立北平图书馆刊》5(3)53-72页1937年。